

日军铁蹄统治下的亚罗士打

(1941—1945)

吉打一夜变天



日本 500 骑脚车队从黑木山攻入吉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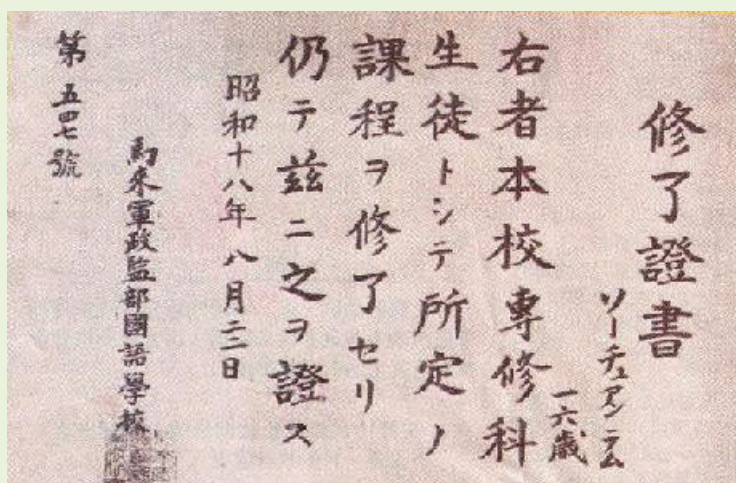
1941 年 12 月 8 日凌晨，日军分三路攻占马来亚半岛。其中一支由 500 名脚车骑士组成的先锋队从黑木山直驱亚罗士打，只花 5 天的时间，日军成功拿下亚罗士打。16 日攻下双溪大年，17 日居林和万达峇鲁失守，全州陷入日军手中。

吉玻两州沦陷后，日军成立马来军政监部，委任助川静二为第一任知事。两州的行政系统接着改组。首先是把吉玻合并成一个行政单位，把州名改为 Kedah Shusei-Chao Sashiki。

州行政议会也重组。各部门首长和秘书，改由日本军官担任。一些街道和桥梁也改为日本名，比如皇家路改为小川路（Jalan Ogama），苏丹亚都哈密大桥改为 Matsurobashi。

此外，日军政府也废除英历法，改以日本历法代之，所有文件以日文书写。官员和公务员上班前，应该举行升旗礼，唱日本国歌。人民被禁止收听英、美广播电台的节目，也禁止华文和英文报出版，关闭华校和英校等。有些华校被充用为日军办事处。

推行奴化教育



马来军政学校颁发的修业证书

教育是塑造民族特征的主要工具。日军政府通过日文教育，培养出效忠天皇的国民。因此为推行奴化教育，首任教育局长由日本人 Mamose 担任。

所有获准开办的学校，都得把日本文列为必修科。校内的音乐课，只能教唱日本歌曲。学生在上课前，必须举行“宫廷遥拜”，行升旗礼，唱日本国歌，然后面朝东方，向日本天皇行鞠躬礼，礼毕才进入教室上课。

初时日军政府禁止华校开办，后来强迫华校复课，有些华校处于淫威之下，为明哲保身及保护校产起见，遵令开课，多数家长仍恨日本人入骨，不让儿女去学校读书，甘愿请华文教师到家里来教育儿女。据 1943 年教育局的统计，全吉打共有 36 间华校，学生 4380 人，教师只有 83 人。学校总数不及战前的一半。

华侨中小学重新开办时，也与其他学校一样，仍由日本人控制。校政的处理虽然有一名华裔校长负责，但应听日本人命令行事。日本文被列为必修科，在小学方面，学生学习 Katakana，到了中学，学生才学习 Kanji。但因缺乏懂得日本文的教师，教育局遂在甘术路的马来小学开办日文班，让教师们进修日文。

暹罗接管吉打州行政

1943 年，日本宣布把吉打、玻璃市、吉兰丹、登加楼四州转让给暹罗，作为兑现 1941 年 12 月暹罗答应合作时日本所许下的诺言。1943 年 8 月 20 日，移交手续在曼谷签署，10 月 20 日正式生效。但军权仍由日本控制。驻扎在亚罗士打及双溪大年日本军警部队不必与暹罗商量，也可以随意捉人。

此外，吉打和玻璃市的火车、电话和邮政服务也由日本管理，吉兰丹的火车服务归暹罗负责。

暹罗接管吉打州政权时，国父东姑亚都拉曼受委为教育司，即今日的教育局长。东姑曾向日方建议，成立马来高等学府，并以马来文和暹罗文作为教学媒介语，东姑也建议废除日文教育，但都不获得日军当局的同意。日军警告教师们，若不继续教导日本文，将会受到对付。

暹罗执政时，华校所教导的科目很多，包括泰文、华文、日本文、数学、地理、手工艺、体育以及园艺等科目。当时，注册的学校很多，但多数都已停办，照旧开办的华校，也面临学生短缺的难题。由于空置的校舍相当多，日军拿来作为军警办事处的也不少。

日本展开大肃清行动

日军拿下吉打后，展开大肃清行动，逮捕抗日分子，无数的无辜者和抗日分子惨遭杀害或入狱。

战前在马来亚各地成立的“反法西斯同盟”改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会”，活动地点由城镇转向乡村小镇。吉北的主要根据地是在马泰边境的新督（即今日北方大学所在地）。当时新督华文小学校长陈廷业与陈凤娥夫妇是抗日分子，后来被宪兵杀害。

叛徒出卖同志

在大肃清行动中，一些抗日分子被捕，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他们甘愿投敌当汉奸而出卖同志和诬害清白人士。吉打米较公会座办跛脚陈以及庄昌益和许其臻等人投敌后，出卖不少抗日分子，以致不少抗日分子和无辜者被捕入狱，残遭种种毒刑和绞刑。

华侨中学 10 余名学生被捕入狱。在狱内他们受到残酷的毒刑，因忍受不住毒打，商议作假口供，集体承认是马共党员。没想到学生们所作之假口供被宪兵识破，结果又遭到毒打。其中 4 名学生被打至死，其余至日本投降后才被释放出来。

由于叛徒手段毒辣，有不少遭到抗日分子清算。槟城有两名凶狠的叛徒，举止无法无天，人民抗日军首领伍仙护老师与 4 名住在槟城的同志诱骗两名叛徒到华人公墓去，就一齐动手用刀刺杀他们。但没想到一人没有即时断气，向宪兵讲述他们遇难经过，结果伍仙护等 5 人被捕，受尽折磨后全被处绞刑。

华校教师是马来军政监部（日本政府）所最痛恨的人士，因为日军政府认为，华校教师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因此宪兵部队特别监视年轻的华校男女教师。凡是举止异常的教师，都会被宪兵怀疑为抗日分子或马共成员而加以逮捕入狱。在华侨中小学执教的柯连务、梁栋材、蔡有松、许逸似、黄文章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被捕入狱。在狱内遭受毒刑后，全都是丧命于日本鬼子的屠刀下。

学校董事和阅书报社会员也成为宪兵的猎物

日据时期，不止师生被宪兵拘捕，华侨中小学的董事会成员也不例外。只要有人投报，宪兵就会把他抓去。陈荣树是华侨中小学董事会要员，曾被宪兵视为抗日分子而两次被捕。张鸿日和谢敦禄医生也遭遇到相同命运。教师江玉丝也被抓去关一个星期。

日本宪兵也非常痛恨华人的文化团体，尤其是青年人组织的团体。当日军知悉有积极抗日分子在中华阅书报社活动并发现了该社的建业石碑后，就下令通缉姓名刻在石碑的抗日分子，但许多抗日分子早已闻风而逃，日军未能捕获他们。

日本宪兵行刑的手法真令人切齿，百姓犯错常被拳打脚踢来对待。陈敬文校长在二战时期是中国当局派来马来亚的槟城和吉打刺探日本军情的特工。他在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家属看到或听到亲人遇害的心情：“死难家属一听到死讯，无不肝肠欲断，抢天呼地，人间悲剧，莫甚于此。到处听到寡妇痛哭丈夫，父母痛哭爱儿，满目凄凉，哀鸿遍野，此种悲痛之惨状，实令人切齿痛恨。”

华侨学校董事部要员救过不少人

日军入侵吉打后成立‘华侨协会’，华侨学校数名董事部要员如锺文贤、陈荣树等被委为“华侨协会”委员。锺文贤则任“华侨协会”会长。“华侨协会”每逢有宴会或庆祝节目，都会邀请日本军政要员、宪兵部、警备队的各级首长和主要日本商人来参加，以表示支持和响应日本马来军政监部“同心协力”的要求。这种作法有利于掩护“华侨协会”内部同盟人员的抗日活动，有些被捕的抗日分子，被抓去后经过“华侨协会”的协助而重获自由。

另有一位例子，如大肃清时，100多名无辜者被捕者，由陈荣树、锺文贤和骆清河各出150元，交给宪兵伍长，即可获得释放，无一人受到伤害。

马来狱卒解救受害者

日治时期，有不少马来人当狱卒，他们在狱内看到不少宪兵酷打虐待抗日分子的事件。有些有正义感的马来狱卒看不过宪兵的残忍手段而感到忿慨，其中一位名叫阿末（Ahmad）的狱卒曾在华侨学校读过书，抗日分子利用他刺探狱内的消息。

1942年杪，米较公会座办跛脚陈和许其臻被抓入狱而叛党，当时有10余名华侨中学生受害入狱是被跛脚陈和许其臻所陷害。此事是狱卒阿末透露出来的消息，抗日首领才知10余名学生被捕的真相。

日本宪兵在狱内严施酷刑，罪案累累。抗日中坚分子刘荣光担忧日军为免留下活口，会在正式缴械之前杀害狱内的抗日分子、学生和无辜受害者，就派遣与马来狱长仄拉（Che Lah）有来往的党员说服仄拉，把关押在狱内的抗日政治犯及200余无辜人民释放出来。仄拉把他们释放出来以后，就带领全家人逃回自己的老家藏匿起来。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亚罗士打尚有不少可歌可泣的动人事件，都与华侨中小学校的董事、师生有关。